

“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

郭宝明¹, 杨建锋²

(1. 福建理工大学 组织部, 福建 福州 350118; 2. 福建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与核心命题, 关乎中华民族在文明激荡中确立精神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根本问题。聚焦“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 通过思想探源, 厘清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性理论视域下中华文化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的内涵。传统文化失序下的“古今之争”与道路探寻进程中的“儒马之争”, 引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结构性冲突; “两个结合”在推进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契合融通, 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 有效破解文化主体性困境。在新的历史阶段, 应把握好守好“魂脉”与筑牢“根脉”的内在张力, 推动理论创新, 秉持开放包容, 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不竭动力。

关键词: “两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6)02-0110-08

Logic path of “Two Combination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GUO Baoming¹, YANG Jianfeng²

(1.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n original concept and core proposition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establishing spiritual autonom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idst the tumult of civilizations. Focusing on the logical reasoning, inherent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the self-awareness, autonomy, and self-sufficiency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n practical subjectivity.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amid the disord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ba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developmental paths have triggered structural confli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Two Combinations” have further revealed the compatibility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dvancing the essence-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ctivated the cultural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grasp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upholding the “spiritual vein” and consolidating the “cultural root”,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nsolidat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provide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cultural subjectivity;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icization and contemporarization of Marxism

收稿日期: 2025-09-03

基金项目: 2024年福建省财政厅一般项目(GY-S24178)

第一作者简介: 郭宝明(1972—), 男, 福建福鼎人, 助理研究员, 硕士, 研究方向: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文明交流互鉴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立并巩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关乎民族精神独立、国家发展道路与文化自信自强的核心议题。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是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标识与内在根基。习近平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288},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境界,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命题,深刻回答了中华民族何以在文明激荡中确立精神自主性、筑牢文化自信根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体性的思想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彰显的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是洞察“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的前提条件。

一、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探源

关于主体思想,人类思想史上早已有所探索,其中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肇始于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实现了哲学史上“人”的初步觉醒。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重大命题,确立了一个不可置疑的基点——思考着的“我”。这个“我”作为思维主体,同时也是心灵与精神的存在,是一种独立且自明的存在,是认知的起点与可靠的来源。康德彻底改变了认识论的方向。他认为,客体必须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知识是主体运用先天形式对感官材料进行综合构造的产物。黑格尔将主体性概念推向顶峰。在他看来,真正的实体——“绝对精神”,不是僵化的存在,而是自身能动、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主体。整个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主体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最终回归自身的辩证过程。尽管西方古典哲学家们对主体性范畴进行了一系列深邃的探索,但这些思想的逻辑内核仍是基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层面,并没有从人的能动性层面探讨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从现实出发,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主体性丧失的基础上,揭示了作为现实的人

的“实践主体”的力量。

(一) 马克思对抽象主体性的批判与“实践主体性”的确立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主体性抽象化、神秘化为绝对精神。他强调,现实的主体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的人,即“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表现为具有感性的、能够充分认识世界,并能动地、按照既定的规律性的对象性活动改造世界。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现实的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探讨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是生产劳动。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直接手段。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是人具有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并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是“物我一体”的自在性存在。因此,主体性是人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活动意义,在主客体交互过程中具备的高度自主意识。^[3]然而,这种本应成为人的一种自由自在活动的劳动实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异化,即劳动产品、劳动实践与劳动本身成了一种与自身相矛盾的异己的存在。异化劳动使人的主体性彻底沦丧,人无法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确证自身、实现自我,丧失了类本质,并陷入对抗性的社会关系。针对异化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解决异化、恢复和彻底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唯一途径。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的存在物,其主体性在对象化活动(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得到充分展现和确证。人不仅认识世界,更成为自己命运和历史的真正主人,实现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占有。

(二) 近代中国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曲折探索

所谓中华文化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以中华民族为文化主体力量,在文化“自我”与“他者”交流交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主意识和身份自觉。^[4]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彰显的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客体的驾驭能力,是对自身文化的确证性、传承性与

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近代以来,文化大家们基于“何为‘我们’”这一命题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持续深刻反思。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捍卫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器物层面进行系统性优化。尽管“中体西用”论在实践中暴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并最终失败,但其思想逻辑本身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文化主体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尝试从儒家内部寻找变革资源,尝试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使其能够适应现代世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文化主体。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儒家文化,看似彻底否定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立场,其深层动机仍是为了救亡图存,试图通过引入“民主与科学”这一全新的文化主体,来为中国塑造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灵魂。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这种激进倾向提出了强烈的批判。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划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路向,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前”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调和适中”的。^[5]侯外庐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始终倡导“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6]张岱年则在哲学研究中致力于“综合创造”,他明确指出:“建设未来的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7]

(三) 改革开放后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一段时期内再次遭遇多元文化的挑战。社会上一度将拥抱西方文化视为迈进现代化社会的显著标志,这一文化困境直接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一些人对西方理论、制度和生活方式盲目崇拜,对中华文化丧失信心。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作为一种新型霸权形式,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以王沪宁提出政治实体必须维护和加强自己“文化主权”^[8]。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著名论断,为消解文化主体性式微提供了极富远见的回应方案。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9]这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文化,更包含了一种理性反思和

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91}这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生命力的根基所在的重要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筑牢道路根基,培植丰厚土壤,打开创新空间。“两个结合”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一个融汇古今、兼收中外的新文化生命体,也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冲击、迷茫和求索之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确立。

二、“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召唤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重要特征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与自主性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秩序面临结构性溃败,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坚船利炮与思想交锋中被动失序。这种文化主体性的失序也导致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主体文化的缺位与式微。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危机,能够进一步彰显“两个结合”的现实必然性与历史紧迫性。

(一) 传统文化失序下的“古今之争”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36}。建立在小农经济与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体系,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沉重打击,陷入“既无法实现现代转型,也难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秩序,在列强舰炮与商品倾销的冲击下加速解体。“自由传教”包装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教育体系改造中的西方知识霸权,共同消解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依附。李大钊曾深刻指出:“西

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因之崩毁,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11]文明“蒙尘”导致中华民族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中华大地一度失去文化主体性。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产生了二元对立。一方面,文化激进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不自觉陷入文化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加速了文化主体性的消解。正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导致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普遍交往乃至文化的世界性特征也愈发鲜明,“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0]35}。激进派们“只看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却忽视文化主体自觉是融贯中西的先决条件”,导致现代化方案脱离中国土壤。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固守中华文化本位”,却未意识到传统思想体系在现代化语境中已丧失基本功能^[12],无法有效回应近代以来民族复兴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关切。在缺乏先进思想指引时,中国文化无力自发融合西方文明,深陷“不对等文化冲突”^[13]。这种主体缺位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困局。“没有文化主体性作为内核支撑,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认同”,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百年求索,本质是文化主体性缺位下的道路试错。洋务运动试图以器物革新维护文化本体,却因制度滞后而失败;戊戌变法企图嫁接君主立宪,终因根基虚浮而夭折;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旗帜,但仍未能解决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后,关于文化领域的“古今之争”依然延续,因此,亟须一种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新的思想体系,重塑中华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形成有机文化生命体。

(二) 道路探寻进程中的“儒马之争”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便有学者将其与其他西方思想一并归为“西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领导地位。但依然有个别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的时空差异,用“中西”或“体用”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思想分野。新世纪前后此类思潮依然在思想界占有一定位置。他们提出要立儒教为国教,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甚至抛出颇具攻击性的言

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儒学、儒教确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14]此类“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潮片面夸大传统文化的超验性,试图以儒家“仁”为主导的道德至上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严重忽视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场域错位。与此同时,理论界还存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此类观点主张“以马废儒”,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视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残余,认为其本质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需依赖本土文化土壤。这种观点忽视传统文化中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片面放大其糟粕,不仅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起不到实质作用,而且还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民族化载体,成为无源之水。^[15]这两种错误思潮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关联,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根基。要消解这种“儒”“马”之间的二元对立,弥合思想分野,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三、“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作用机理

“第二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之间的契合与融通,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筑牢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过程中消解质疑,超越旧有观念,掌握精神主动,合理化解了身份困惑,赋予中国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文化底蕴,在守正创新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问题。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契合融通,破解“儒马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288-289}由于产生的时空背景存在差异,在过往的历史与文化叙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弥合的思想分野。新文化运动通过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大众视野扫清了思想障碍,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互释性与契合性的讨论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两

种思想理论之间矛盾性与排斥性的争议也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以儒代马”和“以马废儒”两种论调。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近代中国急于推动社会整体性变革,导致中华文化在各种思想交锋中出现某种式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自身尚未形成能够有效嵌入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全盘否定其思想内涵与精神内涵中的合理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治国理念、人本思想以及价值追求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存在耦合和差异,属于一种“异中之同”。在理想社会形态方面,中华民族自古便倡导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理想社会的形态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周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将阴阳对立统一、相互依存、转化平衡的规律视为宇宙生成与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庸之道追求动态平衡、执两用中、过犹不及。这种朴素辩证法不仅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固有思维方式,也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有相似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治理思想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初始形态与文明演化延伸出高度统一的治理方式,多元一体与大一统思想在儒家道德秩序的支撑下逐步形成中华文明治理方式的传统路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以权威原则推动组织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 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破解“古今之争”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同时中华大地文化主体性一度丧失,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优先的话语叙事下沦为“落后”文化。“两个结合”的横空出世,不仅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古老文明的相互碰撞,更是通过相互赋能与体系化整合,让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璀璨光芒。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普遍出现治理赤字的大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治理观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方面的巨大优势进一步凸显,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文化在现代文明下的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288}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唯一以

国家形态存续至今且没有出现中断的文明。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华版图地质复杂多元,平原、盆地、高山、草原、河流、海洋等多种地貌特征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文化在治理大陆文明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保证了在与周边文明的交融过程中主体文明始终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传承性。黄仁宇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16] 儒家文化构建的道德秩序、宗法意识以及由此派生的大一统思想使主体文明始终能够以“正统”的形式存续,即便长期受到华夷之辩的思想影响,主体文明与边缘文明之间的冲突始终能够在遵循正统的思想引领下自我弥合。中华文明主张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崇尚天下大同的和合之道,善于找寻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契合之处,实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有机统一。边缘文明在获得统治地位后不但没有导致主体文明的消亡,反而在其思想文化体系的辐射与吸收下,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共同构筑具有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演变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 “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提出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88},让社会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彻底转变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与文明面前曾经的式微姿态,打破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古今之争”,寻找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历史文化根脉的联结与延续,破解了文化激进主义者关于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思想误区,打破了西方国家基于“文明—野蛮”叙事范式所构筑的文化霸权,在筑牢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过程中消解质疑,超越旧有观念,掌握精神主动,让中华文明重新焕发文化生命。

(三) 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推进中华文化守正创新

中华民族一贯秉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维,故而中华文明显现出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得益彰的创新性特质。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再

“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

郭宝明¹, 杨建锋²

(1. 福建理工大学 组织部, 福建 福州 350118; 2. 福建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与核心命题, 关乎中华民族在文明激荡中确立精神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根本问题。聚焦“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 通过思想探源, 厘清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性理论视域下中华文化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的内涵。传统文化失序下的“古今之争”与道路探寻进程中的“儒马之争”, 引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结构性冲突; “两个结合”在推进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契合融通, 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 有效破解文化主体性困境。在新的历史阶段, 应把握好守好“魂脉”与筑牢“根脉”的内在张力, 推动理论创新, 秉持开放包容, 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不竭动力。

关键词: “两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6)02-0110-08

Logic path of “Two Combination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GUO Baoming¹, YANG Jianfeng²

(1.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n original concept and core proposition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establishing spiritual autonom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idst the tumult of civilizations. Focusing on the logical reasoning, inherent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the self-awareness, autonomy, and self-sufficiency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n practical subjectivity.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amid the disord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ba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developmental paths have triggered structural confli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Two Combinations” have further revealed the compatibility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dvancing the essence-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ctivated the cultural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grasp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upholding the “spiritual vein” and consolidating the “cultural root”,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nsolidat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provide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cultural subjectivity;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icization and contemporarization of Marxism

收稿日期: 2025-09-03

基金项目: 2024年福建省财政厅一般项目(GY-S24178)

第一作者简介: 郭宝明(1972—), 男, 福建福鼎人, 助理研究员, 硕士, 研究方向: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文明交流互鉴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立并巩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关乎民族精神独立、国家发展道路与文化自信自强的核心议题。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是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标识与内在根基。习近平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288},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境界,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命题,深刻回答了中华民族何以在文明激荡中确立精神自主性、筑牢文化自信根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体性的思想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彰显的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是洞察“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的前提条件。

一、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探源

关于主体思想,人类思想史上早已有所探索,其中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肇始于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实现了哲学史上“人”的初步觉醒。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重大命题,确立了一个不可置疑的基点——思考着的“我”。这个“我”作为思维主体,同时也是心灵与精神的存在,是一种独立且自明的存在,是认知的起点与可靠的来源。康德彻底改变了认识论的方向。他认为,客体必须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知识是主体运用先天形式对感官材料进行综合构造的产物。黑格尔将主体性概念推向顶峰。在他看来,真正的实体——“绝对精神”,不是僵化的存在,而是自身能动、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主体。整个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主体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最终回归自身的辩证过程。尽管西方古典哲学家们对主体性范畴进行了一系列深邃的探索,但这些思想的逻辑内核仍是基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层面,并没有从人的能动性层面探讨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从现实出发,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主体性丧失的基础上,揭示了作为现实的人

的“实践主体”的力量。

(一) 马克思对抽象主体性的批判与“实践主体性”的确立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主体性抽象化、神秘化为绝对精神。他强调,现实的主体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的人,即“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表现为具有感性的、能够充分认识世界,并能动地、按照既定的规律性的对象性活动改造世界。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现实的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探讨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是生产劳动。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直接手段。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是人具有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并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是“物我一体”的自在性存在。因此,主体性是人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活动意义,在主客体交互过程中具备的高度自主意识。^[3]然而,这种本应成为人的一种自由自在活动的劳动实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异化,即劳动产品、劳动实践与劳动本身成了一种与自身相矛盾的异己的存在。异化劳动使人的主体性彻底沦丧,人无法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确证自身、实现自我,丧失了类本质,并陷入对抗性的社会关系。针对异化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解决异化、恢复和彻底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唯一途径。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的存在物,其主体性在对象化活动(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得到充分展现和确证。人不仅认识世界,更成为自己命运和历史的真正主人,实现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占有。

(二) 近代中国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曲折探索

所谓中华文化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以中华民族为文化主体力量,在文化“自我”与“他者”交流交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主意识和身份自觉。^[4]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彰显的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为性,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客体的驾驭能力,是对自身文化的确证性、传承性与

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近代以来,文化大家们基于“何为‘我们’”这一命题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持续深刻反思。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捍卫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器物层面进行系统性优化。尽管“中体西用”论在实践中暴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并最终失败,但其思想逻辑本身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文化主体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尝试从儒家内部寻找变革资源,尝试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使其能够适应现代世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文化主体。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儒家文化,看似彻底否定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立场,其深层动机仍是为了救亡图存,试图通过引入“民主与科学”这一全新的文化主体,来为中国塑造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灵魂。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这种激进倾向提出了强烈的批判。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划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路向,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前”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调和适中”的。^[5]侯外庐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始终倡导“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6]张岱年则在哲学研究中致力于“综合创造”,他明确指出:“建设未来的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7]

(三) 改革开放后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一段时期内再次遭遇多元文化的挑战。社会上一度将拥抱西方文化视为迈进现代化社会的显著标志,这一文化困境直接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一些人对西方理论、制度和生活方式盲目崇拜,对中华文化丧失信心。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作为一种新型霸权形式,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以王沪宁提出政治实体必须维护和加强自己“文化主权”^[8]。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著名论断,为消解文化主体性式微提供了极富远见的回应方案。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9]这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文化,更包含了一种理性反思和

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91}这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生命力的根基所在的重要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筑牢道路根基,培植丰厚土壤,打开创新空间。“两个结合”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一个融汇古今、兼收中外的新文化生命体,也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冲击、迷茫和求索之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确立。

二、“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召唤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重要特征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与自主性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秩序面临结构性溃败,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坚船利炮与思想交锋中被动失序。这种文化主体性的失序也导致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主体文化的缺位与式微。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危机,能够进一步彰显“两个结合”的现实必然性与历史紧迫性。

(一) 传统文化失序下的“古今之争”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36}。建立在小农经济与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体系,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沉重打击,陷入“既无法实现现代转型,也难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秩序,在列强舰炮与商品倾销的冲击下加速解体。“自由传教”包装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教育体系改造中的西方知识霸权,共同消解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依附。李大钊曾深刻指出:“西

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因之崩毁,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11]文明“蒙尘”导致中华民族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中华大地一度失去文化主体性。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产生了二元对立。一方面,文化激进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不自觉陷入文化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加速了文化主体性的消解。正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导致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普遍交往乃至文化的世界性特征也愈发鲜明,“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0]35}。激进派们“只看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却忽视文化主体自觉是融贯中西的先决条件”,导致现代化方案脱离中国土壤。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固守中华文化本位”,却未意识到传统思想体系在现代化语境中已丧失基本功能^[12],无法有效回应近代以来民族复兴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关切。在缺乏先进思想指引时,中国文化无力自发融合西方文明,深陷“不对等文化冲突”^[13]。这种主体缺位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困局。“没有文化主体性作为内核支撑,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认同”,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百年求索,本质是文化主体性缺位下的道路试错。洋务运动试图以器物革新维护文化本体,却因制度滞后而失败;戊戌变法企图嫁接君主立宪,终因根基虚浮而夭折;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旗帜,但仍未能解决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后,关于文化领域的“古今之争”依然延续,因此,亟须一种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新的思想体系,重塑中华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形成有机文化生命体。

(二) 道路探寻进程中的“儒马之争”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便有学者将其与其他西方思想一并归为“西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领导地位。但依然有个别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的时空差异,用“中西”或“体用”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思想分野。新世纪前后此类思潮依然在思想界占有一定位置。他们提出要立儒教为国教,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甚至抛出颇具攻击性的言

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儒学、儒教确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14]此类“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潮片面夸大传统文化的超验性,试图以儒家“仁”为主导的道德至上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严重忽视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场域错位。与此同时,理论界还存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此类观点主张“以马废儒”,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视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残余,认为其本质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需依赖本土文化土壤。这种观点忽视传统文化中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片面放大其糟粕,不仅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起不到实质作用,而且还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民族化载体,成为无源之水。^[15]这两种错误思潮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关联,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根基。要消解这种“儒”“马”之间的二元对立,弥合思想分野,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三、“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作用机理

“第二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之间的契合与融通,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筑牢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过程中消解质疑,超越旧有观念,掌握精神主动,合理化解了身份困惑,赋予中国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文化底蕴,在守正创新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问题。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契合融通,破解“儒马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288-289}由于产生的时空背景存在差异,在过往的历史与文化叙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弥合的思想分野。新文化运动通过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大众视野扫清了思想障碍,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互释性与契合性的讨论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两

种思想理论之间矛盾性与排斥性的争议也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以儒代马”和“以马废儒”两种论调。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近代中国急于推动社会整体性变革,导致中华文化在各种思想交锋中出现某种式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自身尚未形成能够有效嵌入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全盘否定其思想内涵与精神内涵中的合理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治国理念、人本思想以及价值追求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存在耦合和差异,属于一种“异中之同”。在理想社会形态方面,中华民族自古便倡导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理想社会的形态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周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将阴阳对立统一、相互依存、转化平衡的规律视为宇宙生成与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庸之道追求动态平衡、执两用中、过犹不及。这种朴素辩证法不仅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固有思维方式,也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有相似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治理思想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初始形态与文明演化延伸出高度统一的治理方式,多元一体与大一统思想在儒家道德秩序的支撑下逐步形成中华文明治理方式的传统路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以权威原则推动组织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 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破解“古今之争”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同时中华大地文化主体性一度丧失,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优先的话语叙事下沦为“落后”文化。“两个结合”的横空出世,不仅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古老文明的相互碰撞,更是通过相互赋能与体系化整合,让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璀璨光芒。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普遍出现治理赤字的大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治理观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方面的巨大优势进一步凸显,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文化在现代文明下的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288}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唯一以

国家形态存续至今且没有出现中断的文明。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华版图地质复杂多元,平原、盆地、高山、草原、河流、海洋等多种地貌特征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文化在治理大陆文明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保证了在与周边文明的交融过程中主体文明始终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传承性。黄仁宇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16] 儒家文化构建的道德秩序、宗法意识以及由此派生的大一统思想使主体文明始终能够以“正统”的形式存续,即便长期受到华夷之辩的思想影响,主体文明与边缘文明之间的冲突始终能够在遵循正统的思想引领下自我弥合。中华文明主张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崇尚天下大同的和合之道,善于找寻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契合之处,实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有机统一。边缘文明在获得统治地位后不但没有导致主体文明的消亡,反而在其思想文化体系的辐射与吸收下,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共同构筑具有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演变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 “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提出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88}, 让社会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彻底转变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与文明面前曾经的式微姿态,打破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古今之争”,寻找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历史文化根脉的联结与延续,破解了文化激进主义者关于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思想误区,打破了西方国家基于“文明—野蛮”叙事范式所构筑的文化霸权,在筑牢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过程中消解质疑,超越旧有观念,掌握精神主动,让中华文明重新焕发文化生命。

(三) 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推进中华文化守正创新

中华民族一贯秉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维,故而中华文明显现出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得益彰的创新性特质。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再

到儒释道三者和谐共存,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始终坚守“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既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不断吸收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元素实现融合再创新的精神谱系。这种建立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思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完整形塑了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成功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调整,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须构建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两个结合”,不仅破解了“古今之争”与“儒马之争”,还预示着中华文明中的创新性特质在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两个结合”的理论建构,能够有效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克服自身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陈旧观念,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两个结合”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守正,守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正,创新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会固守旧有观念,而是在尊古而不复古的思想指引下实现由内及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历史逻辑特性。^[18]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没有像近代中国那样陷入“古今中西之争”“体用之争”,而是兼顾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兼顾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两个结合”系统性改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性的部分,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同时又激活了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将“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社会的生存场域中,使其具有破解治理赤字与发展困境的现实价值,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9]作为“两个结合”理论观照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并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有机融入现代文明与现代化建设的发

展脉络当中,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第二个结合”从历史观和文明观的角度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并赋予古老文明新的文化生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则从精神力量层面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探索意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20]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让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获得了更加坚定的精神自主,同时,又能够让中华文化以更加自信与自立的姿态充分吸收“古今中西”文化精华,“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1],进而探索更加璀璨夺目的文明道路。

四、“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22],新的历史征程中,要继续深化“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民族复兴。

(一)时刻保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定力

坚持“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坚持“第一个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与基本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坚持“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为强国建设与复兴伟业构建了超越传统叙事的一条全新道路,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可以说,“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国伟业的重要理论法宝。通过“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道路问题的总钥匙,并以此为指导,在正确道路上拓宽事业发展途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也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政治优势。新时代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党管宣传、

到儒释道三者和谐共存,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始终坚守“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既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不断吸收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元素实现融合再创新的精神谱系。这种建立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思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完整形塑了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成功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调整,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须构建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两个结合”,不仅破解了“古今之争”与“儒马之争”,还预示着中华文明中的创新性特质在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两个结合”的理论建构,能够有效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克服自身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陈旧观念,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两个结合”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守正,守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正,创新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会固守旧有观念,而是在尊古而不复古的思想指引下实现由内及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历史逻辑特性。^[18]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没有像近代中国那样陷入“古今中西之争”“体用之争”,而是兼顾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兼顾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两个结合”系统性改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性的部分,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同时又激活了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将“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社会的生存场域中,使其具有破解治理赤字与发展困境的现实价值,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9]作为“两个结合”理论观照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并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有机融入现代文明与现代化建设的发

展脉络当中,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第二个结合”从历史观和文明观的角度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并赋予古老文明新的文化生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则从精神力量层面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探索意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20]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让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获得了更加坚定的精神自主,同时,又能够让中华文化以更加自信与自立的姿态充分吸收“古今中西”文化精华,“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1],进而探索更加璀璨夺目的文明道路。

四、“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22],新的历史征程中,要继续深化“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民族复兴。

(一)时刻保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定力

坚持“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坚持“第一个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与基本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坚持“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为强国建设与复兴伟业构建了超越传统叙事的一条全新道路,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可以说,“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国伟业的重要理论法宝。通过“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道路问题的总钥匙,并以此为指导,在正确道路上拓宽事业发展途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也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政治优势。新时代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党管宣传、

党管文化的体制机制,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强有力的理论声音回应有关质疑,积极引导理论研究、文化思潮与社会舆论,消除过往的文化自卑、文化自负等负面认知,让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民族性、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统一。

(二) 在守好“魂脉”与筑牢“根脉”中推动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95}一方面,以“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23]14}“魂脉”的确立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确保我们在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不会走入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脉”,深刻阐释了“我是谁”“从哪里来”等一系列源头性问题,确保了文化主体性,巩固奠定了根植在血缘与文缘中的身份认同。一旦这个“根脉”没有筑牢,就会出现身份认知错位与文化自信缺失等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牢把握“魂”与“根”的具体内涵与相互关系,不得混淆二者概念或割裂二者联系,而是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积累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又要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筑牢“根脉”,不断研究、挖掘、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矩阵,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精神动力。

(三) 秉持开放包容,积极推进文明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23]48-49}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构建文化主体性不等于封闭排外。“两个结合”的提出并不是要构建一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元互动的理论体系,而是希望构建

更加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外向型文化形态,并积极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实现了文化精神自立和形象塑造,确保中华文明不在文化交流中迷失自我,并以此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同时又以“结合”的姿态彰显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充分把握文明互鉴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坚持“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既要提升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凝聚奋进伟力,又要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适应中国实际、契合中华文化、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资源,不断丰富“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不断发展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在文明交流与文化交融过程中彰显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

(四) 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落实“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中心环节和关键实践路径。“两个结合”视角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非简单的复古或移植,而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与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辩证扬弃、古为今用的过程,旨在激活其内在生命力,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性转化,核心在于对传统文化形式与内涵的改造与提升,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重点在于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补充、拓展与完善,要依据时代进步和现实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扩展、深化和升华,发展出其未曾有过的现代形态和理论高度。这要求我们要跳出简单援引古典的窠臼,着眼于解决当代问题,将传统文化要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进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治理等进行深度融合,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文化范式和文化成果,如基于数字技术“活化”珍贵文化遗产、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具有中华气派的文艺精品等。推动“两创”必须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最终目的是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

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扎实有效地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不竭动力。

五、结束语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学理基础,通过对“古今之争”“儒马之争”的有效破解,系统性化解文化主体性构建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塑造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

“魂”,在持续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明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对“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内在联系、作用机理以及实践向度进行了系统总结,进一步提升了筑牢文化自信的话语说服力。未来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两个结合”所创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思想共识与情感认同,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筑牢民族复兴与强国伟业的文化基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3] 杨建锋,潘玉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与原创性贡献[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29-40.
- [4] 董德福,王潇阳.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百年建构与经验启示[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1(2):1-12,123.
- [5]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17.
- [6] 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07.
- [7]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00.
- [8]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9-15.
- [9] 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N].光明日报,1998-06-08(2).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2.
- [12] 杨增崇,范嘉祥.从近代“激进—保守”困境到“第二个结合”: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观[J].教学与研究,2024(11):14-24.
- [13] 潘玉腾,杨建锋.中国共产党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J].东南学术,2025(3):1-13.
- [14] 张世保.评崇儒反马的大陆新儒学思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60-64.
- [15] 戴木才.“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2):1-13.
- [16]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6.
- [17]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N].人民日报,2021-03-26(1).
- [18] 李海青.在坚持“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光明日报,2024-01-03(2).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 [20] 沈江平,丁耀鹏.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4):40-49.
- [2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 [22]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11-30(1).
-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王圆圆)